

苏轼谒胡瑗墓考述

□彭伟

胡瑗(993—1059年),字翼之,如皋人,教育家、思想家。他是北宋理学先驱,创立理学“安定学派”,为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,创立苏湖教法,闻名海内。胡瑗祖籍陕西安定堡,故而世人尊称他为“安定先生”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,安定先生都受到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范仲淹、米芾、司马光、文天祥等历史名人的推崇。

时至民国,钱穆先生于《国史大纲》中赞誉胡瑗,文史学家、教育家、经学、训诂、版本、校勘专家胡鸣盛先生(1886—1971年)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完成力作《安定先生年谱》。谱末有录,嘉祐四年(1059年)六月,安定先生卒于杭州。朝廷下诏,封于谥号文昭。集贤校理钱公辅(1021—1072年)率领太学生百余人,前往寺庙,悼念恩师。蔡襄《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》、历代《如皋县志》也有记载,1060年,胡瑗长子胡志康将胡瑗下葬于湖州何山之原。其后,胡瑗小儿子胡志正携带父亲衣服,归葬于泰州北——如皋安定乡。多年后,苏轼仰慕先贤,前往胡瑗墓地,作诗一首,录入如皋《胡氏宗谱》,兹录如下:

谒安定胡先生墓

元丰己巳九月望日

仲尼设至教,三千尚躬行。軻氏骋雄词,杨墨不得倾。垂法炳两曜,章为万世程。如何邹鲁后,汨汨失其真。伟哉安定叟,倡道孰与京。深悟一贯旨,体用授诸生。施教各以类,洗洗尽才英。俱成摘与掇,致用良匪轻。所以苏湖士,至今怀令名。我来起肃敬,为才湖之蓍。

诗作起首,孔子、孟子、杨子、墨子四位教育大贤,悉数出场。所谓“失其真”是指时至晚唐五代,先秦诸学说已经失去真传,从而引出安定先生在教育史中的伟大之处:实行分斋教学法,实现“明体达用”的教育目的。因材施教,栉梳辈出,胡瑗培养出大批人才,有程颐、钱公辅、刘彝、孙觉等。苏轼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豪,集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于一身,为后世众多文人所仰慕。然而,安定先生赢得苏轼敬仰,又有诗为证,他在苏轼心目中可与孔孟杨墨并论,无不彰显出胡瑗先生的历史功绩。

只是此作未录入苏轼其他诗文集,仅见于家谱,本就令人起疑。又有谱中录入撰诗时间:元丰己巳,肯定有误。徐建平《胡瑗》(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)已有发现,还有猜测:

元丰己巳,此处有误。元丰为宋神宗年号,自1078年戊午至1085年乙丑,中无己巳年。考苏轼生平,元丰二年因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狱。哲宗继位,累官翰林学士兼侍读,元祐四年己巳,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,此处或为元祐己巳之误,味其诗意,似亦近之。是耶,非耶?待更考。

元祐己巳,苏轼失意仕途,外放杭州,的确是史实。元丰己巳与元祐己巳,仅差一字,可能是讹误。但是“味其诗意”,《谒安定胡先生墓》只是表达了苏轼对于安定先生的赞许与推崇,似乎未曾涉及诗人的政治心境,无味可品。关键点,元



祐己巳年,苏轼人在杭州。胡瑗离世,也在杭州,但是他的两座坟墓分别在湖州与如皋。搜罗众多文献,未有提及胡瑗墓位于杭州。苏轼前往杭州何处见到胡瑗墓呢?而且《苏轼年谱》记述元祐己巳九月望日,苏轼正在杭州欣赏南屏美景,不可能去谒胡瑗墓。

苏轼走访安定先生墓地,不在如皋便在湖州。历代《如皋县志》均无记述苏轼来如的经历。南宋诗人刘过曾作《寄如皋叶尉》,后人将有刘过误作苏过,以为苏轼儿子苏过结缘如皋。既然苏轼未曾履及如皋,那么他去过湖州吗?令他成名的“苏湖教法”,便是指安定先生在苏州、湖州两地教学方案的总结。

胡瑗对于湖州有着深厚的情感。查阅《慈溪乌山胡氏裔源史痕》《湖州文化探源》《湖州历代书画家》等书文,1060年,胡瑗下葬于乌程何山(今湖州南郊道场浜村青山坞),元中遭毁,重建何山向阳坡上,北与道场山相连。1079年4月,苏轼出任湖州知州。他与同僚频频出游,多次畅游道场山,写下名作《游道场山何山》:

道场山顶何山麓,上彻云峰下幽谷。我从山水窟中来,尚爱此山看不足。陂湖行尽白漫漫,青山忽作龙蛇盘。山高无风松自响,误认石齿号惊湍。山僧不放山泉出,屋底清池照瑶席。阶前合抱香入云,月里仙人亲手植。出山回望翠云鬟,碧瓦朱栏缥缈间。白水田头问行路,小溪深处是何山。高人读书夜达旦,至今山鹤鸣夜半。我今废学不归山,山中饮酒空三叹。

诗中“何山幽谷”正是胡瑗墓所在地。1079年正是北宋元丰二年,即己未年。“元丰己未”与“元丰己巳”,仅一字之差。元丰己未年,苏轼的确游览过道场山、何山,应当见到胡瑗墓。不过时间不应该是“九月望日”(九月的月半),《苏轼年谱》记述乌台诗案爆发后,1079年7月28日,苏轼已经被罢免湖州知州的职务,随后被押往京城,因此不可能于9月15日游览胡瑗墓地。苏轼一生至少四回前往湖州。关于其余三回,《苏轼年谱》明确记载相应年份的9月15日,他也不曾去过胡瑗墓地。

综上所述,苏轼应当在元丰己未年前往何山,见过胡瑗墓地。“元丰己巳九月望日”明显是讹误,要么苏轼从未写过此作,要么苏轼在元丰己未年写下这首诗作,具体时间应当是他在湖州的数月里(4月—7月)。

链接

安定先生:谈诚信,论廉洁

□苇航 宋淑娜

胡瑗是北宋理学先驱,世人尊称他为安定先生。有人评价,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。他不同于传统文人一味追求著述,而是注重教育实践,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。胡瑗也有众多论著传世。他在《周易》口义》等书中多次阐述诚信理念,从而逐渐形成有关诚信的系列理论。作为如皋乡贤,安定先生的诚信点评及诚信与廉洁的关系,值得回顾。整体上来说,安定先生多方面、多角度分析出诚信的益处及作用。

有谈诚信对个人的好处,譬如安定先生解读:“其言常信,其行常谨。”他认为一个人说话一直注重信用,行为就会一直谨慎。言而有信、谨言慎行,能防止人闲来无事、道德败坏,保存自己至诚的优秀品质。心地由此善良,不会骄傲。此点正是诚信的约束性。约束性的重要对象,便是官员。胡瑗认可“丧身败德,亡家失天下”的观念,官员道德败坏必然贪腐,亡国亡天下。

有谈诚信对别人的影响,比如解读:“人际相交,正信相接。”他认为在位官员能够正直诚信地对待下属,下属就能充分信任上级,变得正直。父子之间,能够互相正直诚信地对待对方,就不会出现不好的家庭关系。朋友之间,能够互相正直诚信地对待对方,就不会出现不义的行为。人人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诚信,那么人人都会正气凛然、正直做事。又如解读:“推诚待物,同心合谋。”安定先生解读道:君子真心待他人,那么他人也真心对待君子。凡是同心同德的人都会愉快地真心待人。以至他们可以共谋天下大事。上述两例,点明诚信的传递性。传递性中的重要一点便是上下级官员坦诚相见,而不是各怀鬼胎,或狼狈为奸,才能确保官员的廉洁性。

有谈诚信对国家的作用,好比解读:“圣贤推由中之信。”安定先生认为:圣贤之士,能够推广发自内心的诚信,没有偏私,以便取信天下,天下人也会信任他。这是顺应天道。又有解读:“以至诚至信相通。”安定先生认为要用发自内心的极致的诚信对待下属,才可将天下人的心连为一体,使得天下人都信任皇帝。上下内外都因诚信相通,这才是为君治国之道。两则解读,不仅说明诚信的约束性、传递性,更加强调诚信的实用性。以诚信为本,官员才能牢记道德,正如胡瑗论清廉时,强调“心不可变,德不可改”,才可为官清廉。

通过解读诚信“三性”,诚信的价值不言而喻。那么,诚信从何而来呢?安定先生强调“由中之信”,即来自心中、发自内心。如何培育诚信之人呢?安定先生在《周易》口义》中,也有解说:通过教化,“先正其心,不陷邪恶”!所谓官员“不陷邪恶”,正是不落入贪腐的队伍。